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 浙江警察学院课题组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的警察话语体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于打破由西方国家定义的警务现代化模式与话语;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体现在普适性与中国化、政治性与人民性、平安与法治以及现代化与国际化;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源于实践、根植实践和服务实践;从执法领域、犯罪治理、治安治理、科技赋能等方面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警察话语体系的实践性。

关键词 中国警察 话语体系 理论逻辑 现代警务

中国警务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有力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是中国警务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提出,其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警察话语体系,打破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定义的警务现代化模式与话语。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就是要确立中国特色的警务现代化理念,助推构建完善协同高效警务体制机制,支撑法治化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警务工作守正创新,不断塑造中国警务现代化改革的新动能新优势。

一、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内涵

(一) 中国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指在特定社会或文化背景下,语言及其使用规则所构成的一套系统,它包括特定的词汇、表达方式、修辞手段和语法规则,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定观点和价值观。话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的集合,更是通过语言反映并构建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同时,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以本国语言文字对由诸多概念、理论、信念和经验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达,包括概念、范畴、

课题组:课题组长,金诚,浙江警察学院院长、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浙江警察学院叶涛、李亮、丁伟杰、徐永胜、王梦宇、顾鸣镛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警察协会委托课题“中国警察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话语体系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思想文化是话语体系的灵魂，话语体系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建构与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明影响力。话语体系以其自身所负载的思想力量而形成的影响力、支配力、权威力就是话语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此背景下，依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首先逐步成型，为适时开展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警察话语体系

警察话语体系是指警察在执行公务、与公众和其他机构交流以及在内部沟通中所使用的一套语言和表达方式，包括警察使用的术语和专业语言，还反映了警察的职业文化、价值观、法律制度和社会角色。警察话语体系也可表述为警察在机构语境下为完成某种目标任务进行话语实践所依赖的思想系统和行动系统的综合。思想系统包含符号、知识、认知、策略、价值、文化等；行动系统包括机构、体制、制度、技术等。构建警察话语体系不仅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实践上对提升警务管理水平、增强执法效果、促进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为警务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为实现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的警

务工作贡献力量。

建构警察话语体系的意义，一是规范执法行为，确保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遵循统一的语言规范和法律要求；二是沟通与协调，提高警察内部及其与其他机构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效率；三是职业身份和文化的构建，通过特定的话语方式强化警察的职业身份和文化认同；四是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通过规范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提升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众的信任感；五是支撑警察话语实践，组成警察机构话语能力群，支撑和指导机构话语实践，并决定其成效。

警察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语言系统，涵盖了专业术语、表达方式、核心价值观、法律与制度支持、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媒体与公众形象等多个方面。研究警察话语体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警察的职业文化和执法实践，促进警察与公众的沟通和理解。

（三）中国警察话语体系

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背景不同，英美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警察学科，其警察理论研究多属于发散型的实证研究。中国致力于构建公安学及公安管理学学科体系，多侧重于整体性的定性研究。因而中外警察研究在话语体系上可以对话，但很难完全接轨。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既对学术研究有深远影响，也对我国警务实践和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

1. 形成话语共识和方案

促进我国警察组织的制度建构及机制改革，进而影响警务现代化进程。围绕警察话语指向，形成特定的警察话语内容与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各种警察话语平台实现对警察话语对象的传播和影响，推进打造新质公安战斗力。

2. 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果,改善警察与群众的沟通。

警察话语体系,可以识别和规范执法过程中的语言使用,确保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统一、准确和合法的语言,提高执法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了解警察话语的特征和使用方式,有助于警察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3. 优化培训和教育,提升警务管理水平

警察话语体系可以为警察培训和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帮助设计更有效的语言培训课程,提升警察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通过分析警察内部的语言使用模式,可以优化警察组织内部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警务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4. 促进法治建设

警察话语体系可以帮助警察更好地理解和遵循法律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规范性,确保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公正。通过规范警察在司法过程中的语言使用,确保警察证词、报告等法律文书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5. 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通过改进警察与社区和群众的语言交流方式,可以增强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改善警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警察在应对冲突和危机事件中的语言使用,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沟通策略,预防和化解潜在的社会冲突。

6. 提供学术研究的新视角

通过对警察话语体系的深入分析,可以丰富和拓展话语分析、权力理论、身份构建等相关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应用范围。

7. 增强国际警务合作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警察话语体

系的异同,可以促进国际警务合作和经验交流,借鉴和推广先进的警务语言和管理经验。研究警察话语体系有助于设计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警察培训课程,增强国际警务交流的效果。

二、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是指在中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公安机关在警务活动和队伍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术语、表达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理论观念,是对我国公安工作全貌的实践理论表达,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方面,反映警务工作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系统展示我国公安工作的基本原则、职能定位和发展路径。

(一) 理论要义:普适性与中国化

警察话语体系是特定警务模式下的理论范式和科学概念,不同警务模式基于自身警务实践会产生相应的话语体系,其是对特定国家区域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规律总结,也是揭示警务工作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科学工具。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建立在我国公安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其是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重要内容。该话语体系必定包含对全球警务实践的共同机理,在警务工作概念范畴、基本功能任务和指导理念价值等层面能够体现我国公安工作对世界优秀警务理论的借鉴吸收,共同反映警务工作改革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普遍规律。

1.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要在警务实践的共同特征和中国国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警务历史发展看,我国警察制度主要

形成于清末“西学东渐”过程，是在对西方继受发展中逐步成型的，建国后受到前苏联警务模式的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全球警务交流合作又促使对重大警务改革的借鉴吸收。从警务理论构建看，我国公安工作受到西方政治学、法学、犯罪学及管理学理论的一定影响，公安理论研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警务现代化改革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成果，加快融入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规则体系。从当前国际警务最新发展看，统筹运用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需要寻求超越不同国家之个别性差异的共同性警务标准，承认警务实践和理论的规律性发展方向和共通价值。由此，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必然需要融入全球警务发展的共同价值和普遍规律，这既体现在全球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预防打击犯罪理论、保护公共安全、维护公平正义、制约权力运行、尊重保障人权等基本警务理念，同时也包含国际经济合作、社区警务、智慧警务、服务型警务等现代化警务机制。

2.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必须反映出中国自身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等基本国情，致力于中国特色公安理论与公安工作的实践，能够深刻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我国警察的性质特点、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等特质

警务工作需要符合本国国情并非我国特色，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警务制度和理论均需在本国国情基础上发展形成。在我国公安工作和理论体系中，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治理与枫桥经验、群众路线方针等蕴含要素需要得到体现。例如在法治公安建设方面，我国按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三元结构来构建法治公安的逻辑起点，区别于西方以政治国家和

市民社会对立的构架路径，由此形成确保公安工作在法治轨道内运行的基本思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我国推广“群防群治”的社会治理模式，社区警务建设强调构建警民融合关系，以此通过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来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在智慧警务方面，我国致力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警务效能，实现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和预防等。

（二）根本原则：政治性与人民性

1.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必须合理阐释我国公安工作的政治性问题

公安工作政治性问题就是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全面绝对领导。在组织架构中，公安机关体现为政法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双重架构。公安机关的成立、发展、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政法工作会议以及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等重大会议重要论述中，均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置于核心位置并予以深刻强调。从我国公安工作发展的历史落实、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出发，党的领导在公安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2.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要深刻体现我国公安工作的人民立场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公安工作的人民性。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公安工作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性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性质和人民主权的原则，是公安工作的根本属性。其次，我国公安工作基本任务决定公安工作的人民性。我国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均是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展开的，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我国公安工作就是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满足人民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需求。

(三) 主体内容：平安与法治

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重要战略。平安中国是通过各种措施保障社会治安稳定、提高安全感的战略构想，包括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法治中国是指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战略目标，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中国警察话语体系中，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作为两大本体概念贯穿始终，体现警察队伍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职责使命。

1. 平安中国是“中国之治”的底蕴与优势

当前国内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各类风险的跨界性、关联性、穿透性、放大性显著增强，对国家安全保护、公共安全治理及公安工作提出巨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平安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和内涵外延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低犯罪率的治安环境，而是拓展经济安全社会安定、环境安全、金融安全等更为广泛领域，全面覆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安全体系。这一深刻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治理需求，也对包括公安工作在内的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构建起一套涵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后果转化的全方位防控体系，从

整体上提升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效能水平。由此，中国警察话语体系蕴含着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全局性、战略性任务。

2. 法治中国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和行动指南

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开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到 2020 年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法治中国建设对新时代公安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法治中国建设中有关良法善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公平正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调“关键少数”作用等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的理论体系。在推进各项事业的过程中，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并且逐步形成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作为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我国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应用，坚定树立全面依法治国的职责使命，不断强化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法治思维观念。由此，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包含运用法治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确立公平正义、权力限制、程序公正等法治思维，通过构建法治体系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四) 发展路径：现代化与国际化

1. 公安工作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是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代化模式。其本质要求包括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基本准则，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明确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向。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中国警察话语体系要深入分析我国公安工作现代化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科学总结提炼出规律性的理念认识，以此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新的变革内容，为公安工作现代化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2. 以全球视野和开放姿态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是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中国公安实践与警务理论发展是世界警务制度和警务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安全保障方面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念、制度和办法。对于全球警务实践中所体现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知识，我们应该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借鉴，在此基础上融入时代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国警务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意味着要加强国际警务交流合作，向世界讲述中国警察的故事、传播中国警察的文化及当代中国的公安理论，促进中外警务制度、警务理论和警察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

3. 面向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未来需求是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

改革创新是中国公安工作面向未来的核心概念，变革力和引领力是中国警察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发展是中国公安工作长久以来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抓手。新时代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智慧社会治安治理政策的科

学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等均构成中国警察话语体系中的发展理念和具体举措。从未来方向看，中国警察话语体系要深刻把握智能社会和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规律，立足于对未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前瞻视野、前沿预判和前景规划，把握中国警务和世界警务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用改革理念和未来思维来把握公安工作发展形态及其意义。

三、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的实践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源于实践、根植实践，更好服务实践。长期以来，中国警察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与探索，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形成和丰富，提供了鲜活素材和话语逻辑，同时也对话语体系的印证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归纳起来，可从执法领域、犯罪治理、治安治理、科技赋能等四个警务工作的重点领域来阐释警察话语体系的适用性。

（一）执法话语

执法话语是在执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一定形式表达其执法意图，并旨在达成执法效果的实践方式。警察的执法决定一经送达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会引起相应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种效果即是警察执法的取效行为。中国警察执法话语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从“管理”到“治理”的逻辑演变与实践脉络。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警察在执法话语的价值观方面有所差异。欧美一贯奉行法律至上，法治精神是西方现代警察制度的灵魂。英美两国警察执法过程中，强调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尤其强调执法的程序规范。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情理法相结合、以理释法

的传统,警察执法力求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既是衡量警察执法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也是警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是警察执法工作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

1. 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贯穿于中国警察所有执法过程始终的价值要求

“法律效果”指执法办案中通过严格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促进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尊崇和对法律的遵守;“政治效果”是指执法办案有利于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效果”是指执法办案的行为和结果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并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和谐统一的,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具化,其中,法律效果是前提基础,必须“在法律之内寻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三个效果”作为警察执法话语的价值指引,不仅符合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社会、政治与社会之间相互的紧密关系,也是确保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适应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克服法律局限性和滞后性,实现良法善治和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2. 执法话语的价值理念紧紧围绕“服务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中国警察向来被称为“人民警察”,因为“执法为民、立警为公”是中国警察的宗旨,“有困难找警察”早已深入人民群众之心。中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以人民为

中心,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法过程中尊重人权,强调宽严相济,推行柔性执法,即在合法限度内,以人为本,通过沟通、协商等手段,实现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柔性执法背后的理论依据依然是同三个效果相一致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善治理论以及情理法交融的理念。从“三个效果”到“以人民为中心”再到“柔性执法”,我国警察执法话语在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方面的一惯性形成了闭环。

3. 中国警察执法话语还通过执法话语体系的制度化、作为执法话语载体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以及警察执法过程的智能化表达

一方面,执法话语的制度化通过对警务活动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制度性、体系化。比如,明确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案件清单,扩大了各类非强制手段的适用范围、“少拘慎押”相关意见以及执法裁量标准、执法岗位标准及执法办案流程标准等。另一方面,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作,是中国警察执法话语中最具创新的形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作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形塑了我国法治公安实践的新形态。

(二) 犯罪治理话语

中国警察的犯罪治理话语,是在法治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采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断推进犯罪控制向犯罪预防、犯罪治理模式改革,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犯罪治理目标,统筹发展与安全。我国犯罪治理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警察犯罪治理话语的最佳叙事。

1. 构建了科学的犯罪治理模式

我国犯罪治理模式经历了从运动式治理模式到犯罪综合治理模式,再到新时代多

元化犯罪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国主张政府主导、部门主责、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强调国家治理，集中治理、系统治理、多元治理与全社会治理。这与西方国家主张分散的犯罪治理有较大区别。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理重视“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智能公开的举报奖励机制、打早打小的依法惩处机制、精准有效的督导督办机制、持续推进的组织领导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赋能犯罪治理，实现从事后反应型刑罚治理模式向事先预测预警预防行政监管模式转型。

2. 采取针对性重点威慑策略+常态化治理行动

开展“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以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负面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犯罪为重点，坚持分类施策，依法严厉打击。把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开展食品药品犯罪专项治理。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全国依法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犯罪，以及药品领域特别是针对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人群非法制售假药劣药突出犯罪，强调多部门联合执法、强调风险感知、全环节治理制度，强调监管前置。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面对社会数字化转型和传统犯罪网络化的趋势。中国采取网络空间治理系列性专项行动。如“净网行动”“断卡行动”“断流行动”

等，根据涉网犯罪的基本要素、环节和土壤开展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三）治安治理话语

治安治理处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交织地带，国家对治安问题的治理话语方式经历了“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探索。进入新时代，治安治理理念、体系、机制等持续健全完善，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

1. 治安治理的重心

从“小治安”到“大平安”。推动平安建设、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成为治安治理的应有之意。西方国家的社区治安研究一直存在“技治主义”与“空间主义”两种理论之间的争论。空间主义则源于对技治主义的反思和修正，认为过分强调治安技术，忽视了社区治安本身的特点，那就是社区的“空间性”。空间主义将视野扩展到社区治理，认为社区治理的好坏是决定社区治安的重要条件，社区监控能力不在于监控技术的发达与否，而在于社区凝聚力的强弱，监控取决于“人”而不是“物”；当社区凝聚力较强时，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这样的社区对于破坏性行为就具有较强的监控能力，能够有效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因此，社区治安的终极目标不在于预防犯罪，而在于加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团结，在当下的中国，坚持和发展创新“枫桥经验”，充分运用群众的力量，充分挖掘社区本身的潜力，大力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社区警务，让社区治安治理成为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牢固基石。

2. 治安治理的理念

从重打击到重预防。从“严打”到“综合治理”，从“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

治本”“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从“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到“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治安治理理念从重“打击”到重“预防”，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逐步走向科学的发展过程。强化预防理念需要治安治理主体广泛动员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公安机关与各行政机关合作，包括与司法、城管、民政、工商、文化、房管等相关行政机关合作、配合，在职能范围内共同发挥作用。公安机关应与各类市场组织合作，发展治安服务市场，充分调动它们投身治安服务的积极性。公安机关还要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为各类社会组织投身治安服务搭建平台。公安机关与平安志愿者合作，鼓励其奉献社会的行为，满足其精神需求。

3. 治安治理的路径

从泛刑罚化到重法治化。如果说泛刑罚化展现的治安治理代表着从上到下的一种压制、管理、要求服从的功能，主要靠政策等制度资源来推动，那么法治化展现的治安治理体现为一种平等的、甚至自下而上的商谈、对话、妥协的功能，主要依靠法律法规等制度资源来推动，前者将纠纷看成冲突，通过压制以解决冲突入手，后者将纠纷看成原有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以恢复修复社会关系的方式入手。治安治理的法治化不仅需要严格的权力监督，也需要扎实具体的权利救济。权力监督主要从权力自上到下的角度实现治安治理中治安权的法治化，而权利救济则是自下而上的。权利不仅要和权力监督联系在一起，还要紧紧链接权利救济，这是法治化的应有之意，治安治理才更具有群众基础。

4. 治安治理的发展

由于复杂社会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原本依靠科层体系维持社会治理的方式开始捉襟见肘。如何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激增与科层体系的乏力，成为治安治理的基本矛盾。由此，寻求新手段来缓解这一基本矛盾时，技术自然成为重要手段。“技术下沉”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节约资源，提高现有资源集约化利用。技术逻辑在科层逻辑之外，成为治安治理的新手段和机制。将技术纳入警务运作后，改善了社会风险化后公安部门机构、人员、编制等不足和国家仅仅依靠科层制进行管理的效率问题。在实际运作中，技术逐渐填充了复杂社会形成的新空间，特别是在基层派出所无法面面俱到的地方，技术很快显示出强大的治理效能提升优势。当下治安治理的技术化就是数字化治理，关键在于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如何更精确地感知治安风险、研判治安风险和防控治安风险。

(四) 科技赋能话语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传统警务方式和治理模式难以适应风险社会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带来的挑战。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的科技兴警促进公安工作向主动化、动态化、集约化、精准化、高效化转变。在此背景下，构建科技赋能警务的话语非常重要。

1. 在科技与警务的互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牵引作用

主要表现在：科技发展赋能警务工具创新，提高警务工作效能；科技发展易于打破警种壁垒，促进警务要素流通；科技发展与警务流程深度融合，促进警种业务协同；科技发展倒逼制度调适和优化，牵引警务组织变革。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要求警务机构在引入科技力量的同时，注重对传统警务流程的重新审视与再造。通过打破部门壁垒、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协同效率等措施，实现警务工作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扁平化。警务机构需要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措施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并完善管理制度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革新，更需管理理念的转变和组织文化的重塑。

2. 提升警务信息的透明度，增强警察话语权

以往警务信息往往是封闭的，公众在面临安全问题时，常常感到无助与无奈。而今，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信息共享，各类违法、犯罪的情况得以公开，公众可以直观地了解地区的平安状况。这不仅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也为警察提供了有效的反馈机制，促进了警察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科技赋能，数据公开能够促进社会集体智慧的发展和应用。数字时代，海量及多元的数据使得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成为数据的使用者与贡献者，参与警务工作的分析与评价，使公众有参与感与归属感，将警务工作贴近民心，更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同时，借助大数据的力量，智慧城市的理念得以实现，更加人性化的警务服务也随之而来，增强了警察的话语权。

3. 增强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与信任

科技的进步为各个领域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尤其在公共安全与警务工作方面，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执法方式，更为公众与警务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与信任的桥梁。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警务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也随之加深。数据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警务工作在决策和部署上变得更加科学和精准。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对违法、犯罪数据的分析，识别出高发案件

的时间和地点，帮助警方合理配置警力，优化巡逻路线。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警务工作的效率，也使得警方在公众面前展现了其专业性与高效性。当公众看到警务系统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时，心中自然会升起对警方工作能力的信任，进而减少对警务工作的误解与质疑。社交媒体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崛起为警方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全新的渠道。通过平台发布警务信息，警方能够及时向公众通报案件进展、分享安全提示，这样的透明度使得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能够主动参与到社会安全的维护中。警方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促使公众更好地理解警务工作的复杂性与必要性。当公众意识到警务工作的艰辛与付出时，自然会对此产生尊重和理解，信任之情油然而生。

4. 促进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监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科技的广泛应用下，警务工作的监督机制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智能监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等新兴科技，被赋予了监督警务行为的重要使命。借助科技手段，违法乱纪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警务操作的透明度得以提升。视频监控的普及使得警员的执法过程也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被记录并分析，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执法争议，增强了警务人员的责任感与警觉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既对中国警学研究有深远影响，也对实际的警务实践和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有效地解决长期存在的“实践腿长、理论腿短”的问题。展望未来，有关中

国警察话语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可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一) 推进中国警察话语学理化

加强对中国警学研究的理论创新研究,形成富有学理性的表述方式、表达风格,提升中国警学研究传播的知识性、可读性。建立中国警务和警学研究的学术宣传和学术解读机制,以学术话语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加强新型公安智库和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打造高端警学研究平台。促进警察院校、警学研究平台、媒体的协同创新,构建警学话语创新共同体。

(二) 推进中国警察话语普及化

坚持研究与普及并重,推进学术成果的通俗化、大众化表达。创新传播方式,拓展传播渠道,提高中国警学研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能力和水平,增进社会公众对中国警察和警务工作的了解。加大中国警察学术普及与传播工作力度,增进警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提升警学研究的学科影响力,打造良好的警学研究生态。

(三) 推进中国警察话语国际化

坚持破立并举、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加快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通过对中国特色警务探索和改革创新的学术话语转化,打造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彰显中国特色和优势的警务理论体系和话语优势。开展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研究,打造高水平警学国际传播平台,增进警学国际交流,开展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培

训,增加高质量警学话语供给,不断扩大中国警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谢伏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5
- [2]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干部培训教材) [M]. 学习出版社, 2020
- [3]梁超、杨武金. 话语体系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基于国内核心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1
- [4]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人民出版社, 2022
- [5]社维超. 2016年: 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推进 [EB/OL]. 2017, 1, 25
- [6]张兆端. 中英美警察管理思想与理论比较研究——兼论推进公安管理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
- [7]金诚. 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内涵、逻辑及实践范式——以浙江的探索为例 [J]. 公安学研究, 2023, 5
- [8]林华瑜、刘茂林. 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论纲 [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22, 4
- [9]张文显. 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J]. 法学家, 2023, 2
- [10]王雷. 美国警察的执法理念 [J]. 现代世界警察, 2014, 9
- [11]朱孝清. 深入学习贯彻“三个效果”相统一思想 不断提高执法办法效果 [J].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3, 46
- [12]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EB/OL]. 2018, 1, 24
- [1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 [EO/OL]. 2021, 5, 20
- [14]陈周旺、申剑敏. 国外治安理论主要模式及其发展趋势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3
- [15]邱煜. 论治安治理的内涵、特征及其实现 [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6, 2
- [16]何艳玲、宋锴业. 社会治理的国家逻辑: 基于警务改革史的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21, 4

责任编辑 尚钰涛